

跨界之始与立学之困：翻译符号学之学术史考察*

王洪林

摘要：基于翻译学和符号学联姻而形成的翻译符号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近年取得新进展。本文从学科归属视角切入，系统梳理翻译符号学演进脉络，指出现有研究尚存在的不足，深入分析翻译符号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以期为推进翻译符号学跨学科研究提供新路径和新视角。

关键词：翻译符号学，符号转换，符号表意

Beginning of Border-crossing and Dilemma of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Wang Honglin

Abstract: Translation semiotics, emerg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emiotics,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identifies the limitations in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ree critical issue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for it to be established as

* 本文为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影视外译符际意义再生与变异机制研究”(23BYY125)、2021—2022浙江省教育厅重大人文攻关课题“‘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文化符号的符际书写与国际传播研究”(2023QN114)阶段性成果。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study aims to offer new pathways and perspectives for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translation semiotics, sign conversion, signification of signs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15

一、引言

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变得愈加复杂, 多模态符号资源已成为社会符号实践的新形态。在符号社会实践活动中, 不同感官渠道参与意义建构。然而, 在视觉模态逐渐成为社会符号实践活动的主要符号资源的同时, 触觉体验没有得到应有关注。有研究指出, 触觉、视觉和听觉文本研究的相互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符号实践的全面理解 (Djonov & van Leeuwen, 2011, p. 542)。事实上, 人类自古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重感官渠道来感知或表征世界 (O'Halloran, 2022, p. 3)。为解决现实社会符号实践中多模态趋势日益明显和对不同模态研究不均衡的问题, 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含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广义符号的表意问题。在此背景下, 翻译符号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近年来, 翻译研究和符号学的联姻, 以及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跨界研究受到学界关注广泛 (王铭玉, 2015; 王洪林, 2020, 2022, 2025)。对于翻译符号学的独立交叉学科属性, 学界逐步达成共识。特洛普 (Peeter Torop) 较早将翻译符号学看作独立交叉学科 (2000)。熊辉 (2025, p. 5) 将翻译符号学看作“一门兼具翻译学和符号学之长而又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独立学科”。关于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归属问题, 学界主要有三大观点: 一是将其看作符号学分支学科, 二是将其看作翻译学分支学科, 三是将其视为独立交叉学科。近年来, 学界对翻译符号学的独立交叉学科属性逐步达成共识。然而, 翻译符号学作为独立交叉学科在取得研究新进展的同时, 也面临困境与不足。主要困境表现为对翻译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够明确, 对符际表意的本质属性理解不够深入, 以及对符号守恒与翻译等值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梳理清楚等几大方面。在此背景下, 从学术史考察视角对其学科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梳理, 进而指出当前研究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据此提出未来研究动向, 对深入推进翻译学和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意义重大。

二、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发展脉络

(一) 作为符号学分支的翻译符号学

翻译符号学，作为符号学与翻译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翻译学与符号学的结合，若从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理论算起，已经拥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若从皮尔斯对翻译问题的探讨算起，也接近百年；而从雅各布森于1959年正式提出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的概念算起，已超过半个世纪（王铭玉，2015，p. 23）。通常认为，雅各布森“开创了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融合的先河”（吕红周，2015，p. 15）。雅各布森翻译三分的提出被认为是“学界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开启了符号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历程”（赵星植，陆京京，2022，p. 108）。无论是符号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关注，还是翻译三分的提出，均得益于符号学和翻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学者皮尔斯（C. S. Peirce）的逻辑符号学（Semiotics）和瑞士学者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语言符号学（Semiology）是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两大源头。皮尔斯的符号学从逻辑哲学的视角出发，考察符号过程或符号表意行为，而索绪尔的符号学则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实践（Lorusso，2015，p. 3）。简言之，皮尔斯的符号学侧重于广义符号的表意行为，而索绪尔的符号学则侧重于探讨语言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两者均是翻译符号学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皮尔斯的符号学侧重于理论思辨，而索绪尔的符号学则强调实践应用。在研究对象上，皮尔斯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多侧重于符号表意，索绪尔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则侧重语言转换和语义生产，而翻译符号学则兼顾符号转换与符际表意两个方面。

符号与翻译关系密切。从符号学视角探究翻译的核心问题一直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所在。截至目前，基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翻译符号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维尔比夫人（Lady Welby）作为符号学的创立者之一，曾通过书信与皮尔斯就符号学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她的表意学（significs）研究将符号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佩特丽莉，2019）。孙凤（2019）系统考察了维尔比夫人的符号表意思想，为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与借鉴。

中国学者对符号翻译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践应用进行了系列深入且持续的研究(王铭玉, 2015; 贾洪伟, 2016a)。王铭玉提出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的倡议(2015)。他还将翻译符号学看作“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2016, p. 1)。随后, 王铭玉、任伟对翻译符号学的学科边界以及翻译符号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进一步厘清了翻译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之间的学科关系。(2017, p. 29)为促进翻译符号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王铭玉提出了八项亟待开展甚至实现突破的工作, 具体包括: “明确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界定翻译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探究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确立翻译符号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构建翻译符号学的术语体系; 建立翻译符号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库; 组建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团队和机构; 创立翻译符号学的专栏或专业期刊。”(2022, p. 95)对这八项工作的系统梳理显示, 研究对象的明确化和概念的界定是深入探索学科内涵的基础, 而研究方法的确立和术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学科的系统性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总体而言, 翻译符号学研究的系统性尚显不足, 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学界基于皮尔斯的广义符号概念提出的有形符号间转换和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间转换的观点, 显著拓展了翻译研究边界。此外, 学界以皮尔斯的三元符指关系为参照对在符号转换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为符号主体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贾洪伟, 2019a)。《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一书对皮尔斯符号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介(2019b)。此外, 贾洪伟还对符指翻译与翻译符号学的本质区别进行了具有创见性的阐释(2020)。已有研究对厘清翻译符号学学科归属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相较于其他符号学分支学科, 社会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受到较多关注, 并产生了广泛影响。陈宏薇(1996)、李明(1997)、王治江(2003)等学者借助社会符号学理论对翻译核心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佟颖(2010)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考察了翻译动机、翻译单位、翻译等值等基本问题。奈达借鉴社会符号学理论对翻译社会符号功能的研究有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王铭玉, 任伟, 2017)。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符号守恒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范围(佟颖, 王铭玉, 2018)。与此同时, 翻译符号学的实践应用研究取得新进展。例如,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中央文献术语翻译策略以及杨柳青木版年画外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吕红周, 2015, 2022)。从翻译符指视角对《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和台本的跨符码、跨媒介翻译阐释模式的考察进一步拓展了影视翻译研究范畴(潘琳琳, 2016)。如上研究不仅丰

富了翻译符号学理论内涵，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与方法。

（二）作为翻译学分支的翻译符号学

符号学被看作揭示翻译研究历史、现状及其演变规律的基本动力 (Coscolluela, 2003, p. 105), 尽管翻译通常聚焦于语言活动, 但其与符号学的联系更为紧密 (Bassnett, 2014)。佩特丽莉 (Susan Petrilli) 曾明确指出: “翻译理论不可能脱离翻译符号学而独立存在。” (2014, p. 210) 针对数字时代翻译范围的拓展, 她进一步提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符号学和翻译理论的倡议 (Petrilli, 2015)。也有学者认为,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翻译学者就开始谨慎地转向符号学” (Kourdis & Kukkonen, 2015, p. 6)。佩特丽莉和扎诺莱蒂 (Margaret Zanoletti) 进一步明确, 翻译研究的“符号学转向” 30 多年前已悄然开始, 时间上紧随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Petrilli & Zanoletti, 2023, p. 365)。由此可见, 符号学视角翻译研究的重要性逐步引起学界关注。

翻译符号学作为翻译学分支的研究起点可以追溯至雅各布森 (Jakobson, 1959/2012)。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雅各布森提出三类翻译的理论基础并非语言学, 而是符号学 (Munday, 2016, p. 9)。具体而言, 雅各布森是基于皮尔斯的符号观而提出翻译三分概念的, 标志着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开端 (Torres-Martínez, 2018, p. 2)。正因雅各布森将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与翻译符号学紧密联系, 至今, 任何翻译符号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对雅各布森符号翻译观的传承与批评 (罗金, 2019, p. 197)。尽管如此, 雅各布森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缺陷。比如, 他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引用主要通过约翰·杜威的研究, 导致其只关注“语言符号的翻译”, 而未能全面关注整个翻译领域 (Coscolluela, 2003, p. 114)。

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视角系统考察翻译问题的学者包括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丁达·格雷 (Dinda Gorlée)、佩特丽莉等。作为翻译符号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德勒达勒·罗德 (Deledalle-Rhodes) 和丁达·格雷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了相关研究 (Stecconi, 2007, p. 16)。格雷借鉴皮尔斯符号学系统考察了翻译符号转换和符际表意问题 (Gorlée, 1994, 2004, 2005, 2015)。格雷的翻译符号学成果通过译介、引介和评介等方式传入中国。贾洪伟翻译并出版了格雷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一书。王铭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该书“算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的代表作, 甚至可以说是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的奠基性作品, 所以这份书

□ 符号与传媒 (32)

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格雷, 2019, p. 10)。格雷的研究“以一种创新视角丰富了翻译学理论”(Weizman & Gorfée, 1995, p. 355)。尤其格雷提出的将翻译视为“无限变化的演进过程”的观点, 为读者重新审视翻译活动提供了“全新视角”(Shen & Dinda, 1996, p. 54)。

1988年同期刊登于《中国翻译》的两篇文章分别为罗进德《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和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 标志着中国翻译符号学研究的正式开端。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理论为解决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某些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提供新的观察角度”(罗进德, 1988, p. 8)。也有学者从符号学视角切入对翻译概念进行了再界定(温洪瑞, 1997, p. 53)。随后, 何家驹立足社会符号学提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1999)。卢巧丹和卢燕飞借助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考察了翻译对等问题, 并提出实现意义对等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2005)。可见, 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 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洞见。

关于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借鉴价值, 学界观点不一。比如, 有研究指出, 符号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研究方法”(Kourdis, 2015, p. 317)。也有学者认为, “符号学提供了一个解读翻译对象的新视角”(刘毅, 2016, p. 122)。翻译符号学通过借鉴“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生态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 必将“为翻译问题提供有效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寇福明, 吕红周, 2017, p. 94) 总之, 就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

(三) 作为独立交叉学科的翻译符号学

翻译符号学还被认为是符号学和翻译学交叉融合后形成的独立交叉学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翻译符号学既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 也是符号学研究的一部分。”(Torop, 2000, p. 597) 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 对符号学和翻译学两个母学科的学科互鉴价值明显。有学者指出, “对翻译过程和符号活动的反思可以帮助两个学科更深入地审视各自领域的问题”(Petrilli, 2015, p. 96)。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作为文化符号学派的杰出代表, 对推进翻译符号学独立交叉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洛特曼(Yuri Lotman)和特洛普是该学派的新、老两代领军人物, 分别从符号域和文本的视角出发, 深入探讨了意义生成机制, 为翻译符号学研究提供了关键理论视角(Lotman, 1990;

Torop, 2000)。特洛普对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及其核心命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Torop, 2000, 2015)。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翻译符号学研究寄予厚望,指出文化符号学有望成为推动翻译研究“符号学转向”的重要理论资源 (潘琳琳, 2021)。

早在 20 多年前,就有学者坚定地指出,“翻译符号学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只是时间问题”(Torop, 2000, p. 607)。近期,熊辉提出翻译学和符号学的天然比邻性造就了两者联姻的学科基础,突出了两者之间的学科互鉴价值,并着重强调了翻译学对丰富和完善符号学原理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2025)。综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就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架构提出见解,但对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本质属性等方面的讨论尚有较大拓展空间。总体而言,翻译学对符号学的理论借鉴和实际应用还远远不够。为进一步推动翻译符号学的纵深发展,尚待对符号转换、符际表意等核心问题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

三、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发展困境与对策

(一) 研究对象待锚定

王铭玉将符号转换视为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2015),但未进一步界定与之紧密相关的系列概念,如符号表意、无限衍义、符号生长等。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涵盖符号转换、符号表意、无限衍义、意义再生与意义变异等核心概念。然而,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差异及其与翻译学和符号学范畴下相关概念的异同之处,尚未得到充分阐释。

翻译与符号的关系密切。原文是翻译活动的起点,译文是终点,两者通过符号转换连接,而关键在于符际表意。翻译被看作“为消除不同符号系统间交流障碍,将一个符号系统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符号系统的相应形式的过程”(温洪瑞, 1997, p. 53)。符号转换作为符际表意的关键手段,在翻译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究其本质,“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问题始终是翻译研究的核心焦点”(王洪林, 2023, p. 87)。而借助符号转换手段在译文中实现原文意义的再生既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

符号转换与符号表意历来受到来自翻译学和符号学两个学科的重点关注。符号学和翻译学都致力探索符号表意过程,即符号的无限衍义,只是侧重点不同。符号学本质上是意义学,符号表意是其核心属性。符号被看作“携带

□ 符号与传媒 (32)

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6，p. 2）。根据佩特丽莉（2015，p. 98）的观点，符号流动和表意过程与翻译/解释过程相汇合，符号表意本身是一个翻译/解释过程，因而建议使用转移、转换、变形、价值重估等词汇来描述翻译过程的不同方面（Petrilli，2015，p. 98）。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符号转换、符号表意、无限衍义、意义再生与变异等概念及其之间的深层关系，从广义符号视角系统考察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跨模态表意问题。

（二）符号表意本质待厘清

翻译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Kourdis，2015，p. 317）。科布斯·马雷（Kobus Marais）从生物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符号表意问题（2019）。一般的符号表意过程通常涉及同一符号系统内不同符号之间的解释和表意。而翻译作为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不仅涉及同一符号系统内部，也涉及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跨符号表意，即符际表意。具体来说，翻译活动涉及语内、语际和符际的转换以及符际表意行为。符号学所关注的符号表意聚焦在同一符号系统内对不同符号的解释，而翻译符号学更加关注不同符号或不同符号系统间的跨模态、跨媒介符号转换与符际表意。

符号表意的关键在于解释项的存在，完成符号表意行为的关键在于符号接收者的解释。符号表意和符际表意分别被视为符号学和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尽管两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刘毅提出“翻译”即“翻意”的观点（2016）。孙风和屠友祥认为，“翻译即‘翻异’，在存有差异的事物间实现转化”（2019，p. 93）。单红和吕红周通过考察符号、对象与解释项的关系，发现“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换后，三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体现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2021，p. 52）从符号表意的视角来看，符号转换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意义变异。显然，符号表意过程中的解释项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解释项成为新的符号并呼唤新一轮解释的关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尔斯后期提出符号即传播媒介的观点（赵星植，2025）。该观点的提出为进一步理解符号传播中的符际表意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

罗金采用符号学与翻译研究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了雅各布森的符号翻译观念（2019）。冯全功则对翻译的符号转换本质属性展开了深入讨论（2022）。尽管翻译符号学雏形初具，但对其核心本质属性的界定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为深入理解翻译符号学的本质属性，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符号转换和符号表意等核心概念。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活动，涉及从一种或

一类符号（例如语言、视觉、听觉、视听等多模态符号）向另一种或一类符号系统的转变。翻译符号学有待进一步探索跨模态符号转换机制及符号表意规律等关键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符号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亟须进一步阐明其符号表意本质。赵毅衡教授率先提出AI符号学概念，并从理据性理论视角对AI文本的组成展开富有创见的讨论（2025）。薛晨围绕数字陪伴人的感觉质熵减实践展开深入讨论，有效回应了AI时代社会符号实践所面临的重要挑战（2025）。胡易容从主体性视角对人类和机器非人符号实践展开细致讨论，提出人机交互与交互主体性等观点（2025）。如上研究针对AI时代符号表意活动面临的挑战展开系列讨论，为进一步厘清AI时代翻译符号学的符号表意等核心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参照。

（三）符号守恒与翻译等值概念待重估

近年来，翻译等值问题再次引起译界重视，符号守恒渐成翻译符号学研究焦点。佟颖和王铭玉曾从社会符号学视角考察过符号守恒问题（2018）。符号守恒的观点与翻译“等值”有相通之处。莫娜·贝克（Mona Baker）从符号学视角对翻译的符号等值问题展开深入讨论（Baker, 2018）。符号等值概念的提出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范式转移到符号学范式，对拓展翻译等值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能引起译界足够关注与重视。

事实上，学界对翻译概念界定的出发点大多基于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关系（李德超，2023，p. 36）。然而，当将翻译概念放置到更大的文化空间进行考察时，会得出不同结论。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来自世界不同文化的大量案例足以证明翻译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2023，p. 32）。鉴于不同文化空间内翻译概念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即使是翻译概念本身也很难做到等值，遑论实现符号守恒。此外，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活动，符号表意与无限衍义相伴而生，这使符号守恒变得极为困难。符号守恒和意义等值更多停留在翻译伦理层面，符号变形和意义变异则是翻译实践中的常态。

学界对翻译等值问题有不同声音。尽管翻译术语源于拉丁语的“搬运或转移”（translation or carrying across），含有被搬运之意（跨越语言、模态或媒介）（Campbell & Vidal, 2019，p. 7），但翻译并非如盖房子那样将砖块从

一个地方搬运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空间重构,而是借助符号转换实现意义再生(Chesterman, 2016, p. 21)。根据变异学观点,翻译涉及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及跨文明转换,“翻译中的变异不可避免”(曹顺庆, 2018, p. 127)。变异学对意义变异问题的关注与翻译符号学对符际表意的考察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差异。变异学关注的是译文在跨文化、跨国界旅行中,面对来自不同于母语文化空间的新的文化空间解释者所产生的新解释意义,而翻译符号学更加关注符号转换过程中的意义生成、再生与变异问题。

四、结语

全方位构建翻译符号学理论话语体系对拓展翻译研究范畴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将翻译研究视角从传统的语言学拓展到更广义的符号学范畴,而且有助于拓宽翻译研究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范围。然而,翻译符号学概念自提出以来,尚未引起翻译学和符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国内翻译符号学研究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对翻译问题的探讨缺乏系统性且整合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对国外学者翻译符号学观点的引介欠全面,已引介成果在学界的受关注度不够且传播范围较小。此外,真正涉足符号学领域且进行翻译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且成果不多。

翻译符号学研究有待从翻译学和符号学理论中进行双向互鉴,实现双向跨学科反哺。翻译符号学需从跨学科乃至超学科视角出发,进一步厘清符号转换、符号表意以及符际表意等核心问题。要使翻译符号学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兴独立交叉学科,仅依靠翻译学或符号学学者是不够的,迫切需要拥有翻译学和符号学跨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从双重学科视角切入,进一步拓展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系统构建翻译符号学理论话语体系并开展相关应用研究。

引用文献:

- 曹顺庆(2018). 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126 - 129.
- 陈宏薇(1996).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93 - 98.
- 冯全功(2022). 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关于翻译定义的若干思考. 中国翻译, 3, 11 - 19.
- 格雷, 丁达(2019). 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贾洪伟, 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何家驹 (1999). 社会·意义·功能——社会符号翻译法的核心. 嘉应大学学报, 2, 74-76.
- 胡易容 (2025). “机器他者”与“符号自我”: 论智媒的交互主体性. 符号与传媒, 1, 19-34.
- 贾洪伟 (2016a).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外语教学, 1, 94-97.
- 贾洪伟 (2016b).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山东外语教学, 3, 90-100.
- 贾洪伟 (2019a). 人在符号转换中的作用——对皮尔士与格雷翻译指过程的批判与建构. 翻译界, 1, 70-81.
- 贾洪伟 (2019b). 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 贾洪伟 (2020). 符指翻译的本质.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43-51.
- 寇福明, 吕红周 (2017). 从符号学看翻译. 外语教学, 2, 91-94.
- 李德超 (2023). 如何定义翻译? ——对翻译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英语研究, 2, 26-39.
- 李明 (1997). 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 上海科技翻译, 4, 7-10.
- 刘毅 (2016). “翻译”即“翻意”的符号学解释. 辽宁医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122-125.
- 卢巧丹, 卢燕飞 (2005). 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对等. 外语与外语教学, 3, 49-51.
- 吕红周 (2015). 从翻译符号学看中央文献术语俄译的策略.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5, 14-22.
- 吕红周 (2022). 从翻译符号学看杨柳青木版年画外译.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9, 102-110.
- 吕红周, 单红 (2016). 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33-39.
- 罗金 (2019).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雅各布森符号翻译观再探. 符号与传媒, 2, 186-19
- 罗进德 (1988). 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 中国翻译, 1, 6-9.
- 潘琳琳 (2016).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26-32.
- 潘琳琳 (2021). 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录.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1, 89-93.
- 佩特丽莉, 苏珊 (2014). 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周劲松,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佩特丽莉, 苏珊 (2019). 维尔比夫人与表意学: 符号学的形成 (宋文, 薛晨,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单红, 吕红周 (2021). 论翻译的间性本质. 翻译跨学科研究, 1, 45-57.
- 孙凤 (2019). 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 孙凤, 屠友祥 (2019). 论维尔比夫人的翻译哲学思想. 符号与传媒, 2, 83-97.
- 佟颖 (2010).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 符号与传媒 (32)

- 佟颖, 王铭玉 (2018). 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 山东外语教学, 1, 99 - 110.
- 王洪林 (2020). 符号学视角下的跨界翻译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王洪林 (2022).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 回顾和前瞻.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6, 116 - 123.
- 王洪林 (2023). 多重跨学科视角下的翻译意义再生与变异问题再思. 翻译研究与教学, 2, 87 - 92.
- 王洪林 (2025). 翻译符号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 焦点与前瞻. 中国翻译, 5, 25 - 32.
- 王铭玉 (2015). 翻译符号学刍议. 中国外语, 3, 22 - 23.
- 王铭玉 (2016).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1 - 10, 18.
- 王铭玉 (2022). “翻译符号学之再探索”专题. 山东外语教学, 4, 95.
- 王铭玉, 任伟 (2017). 从语言符号学到翻译符号学——王铭玉教授访谈录. 外语研究, 5, 25 - 30.
- 王治江 (2003). 《尤利西斯》中语码转换的文学意义论略. 南开学报, 5, 120 - 124.
- 温洪瑞 (1997). 从符号学角度谈翻译. 山东外语教学, 4, 51 - 54.
- 熊辉 (2025). 翻译符号学对符号学的借鉴与突围——兼论翻译符号学的学科独立性. 中国翻译, 2, 5 - 14.
- 薛晨 (2025). AI 驱动下的呈符化危机: 数字人陪伴的感觉质减熵实践. 符号与传媒, 1, 35 - 50.
- 赵星植, 陆京京 (2022). 翻译对等的符号像似机制. 山东外语教学, 4, 107 - 115.
- 赵星植 (2025). 符号作为媒介: 论皮尔斯后期的传播哲学思想. 符号与传媒, 1, 65 - 78.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修订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25). “第四理据性”与 AI 文本的构成. 符号与传媒, 1, 3 - 18.
- 郑伟波 (1988). 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 中国翻译, 1, 20 - 21.
- Baker, M. (2018).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3r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assnett, S. (2014).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M. & Vidal, R. (2019). The Translator's Gaze: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s Transactional Process. In M. Campbell & R. Vidal (Eds.), *Translating across Sensory and Linguistic Borders: Intersemiotic Journeys between Media*, 1 - 36.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Chesterman, A. (2016).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Rev.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oscolluela, C. (2003).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ity. *Semiotica*, 145 (1/4), 105 - 137.
- Djonov, E. & van Leeuwen, T. (2011). The Semiotics of Texture: From Tactile to Visual. *Visual Communication*, 4, 541 - 564.

- Gorlée, D. L. (1994).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2)*.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 Gorlée, D. L. (2004). *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4)*.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Gorlée, D. L. (2005). *Song and Significance: Virtues and Vices of Vocal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5)*.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Gorlée, D. L. (2015). *From Translation to Transduction: The Glassy Essence of Intersemiosis*. Tartu: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 Jakobson, R. (1959/2012).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ition), 126 – 1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ourdis E. (2015).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Peter Pericles Trifonas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 303 – 320.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 Kourdis, E. & Kukkonen, P. (2015).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n Semiotics. *Punct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2, 5 – 10.
- Lorusso, A. M. (2015). *Cultural Semiotics: For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Semio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otman, Y. M. (1990).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 Marais, K. (2019). *A (Bio) semio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Emergence of Social-cultural Rea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Munday, J. (2016).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4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O'Halloran, K. L. (2022). Matter, Meaning and Semiotics. *Visual Communication*, 0 (0), 1 – 28.
- Petrilli, S. (2015). Translation of Semiotics into Translation Theory, and Vice Versa. *Punct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1, 96 – 117.
- Petrilli, S. & Zanoletti, M. (2023). Intersemiotic Approaches. In R. Meylaerts & K. Marai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cept*, 340 – 36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hen, D. & Dinda, L. (1996). Gorlée;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Babel*, 1, 53 – 57.
- Stecconi, U. (2007). Five Reasons Why Semiotics Is Good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Y. Gambier, M. Shlesinger & R. Stolze (Eds.), *Doubts and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5 – 26. Amsterdam: Benjamins.

□ 符号与传媒 (32)

- Torop, P. (2000). Towards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a*, 3/4, 597 – 609.
- Torop, P. (2015). Cultural Semiotics. In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170 – 180. London: Routledge.
- Torres-Martínez, S. (2018). Semiotic Translation. *Semiotica*, 225, 353 – 382.
- Weizman, E. & Gorrée, D. L. (1995).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 355 – 359.

作者简介:

王洪林, 博士, 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符号学、应用语言学。

Author:

Wang Honglin, Ph. D.,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semio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mail: fycarol61@163.com